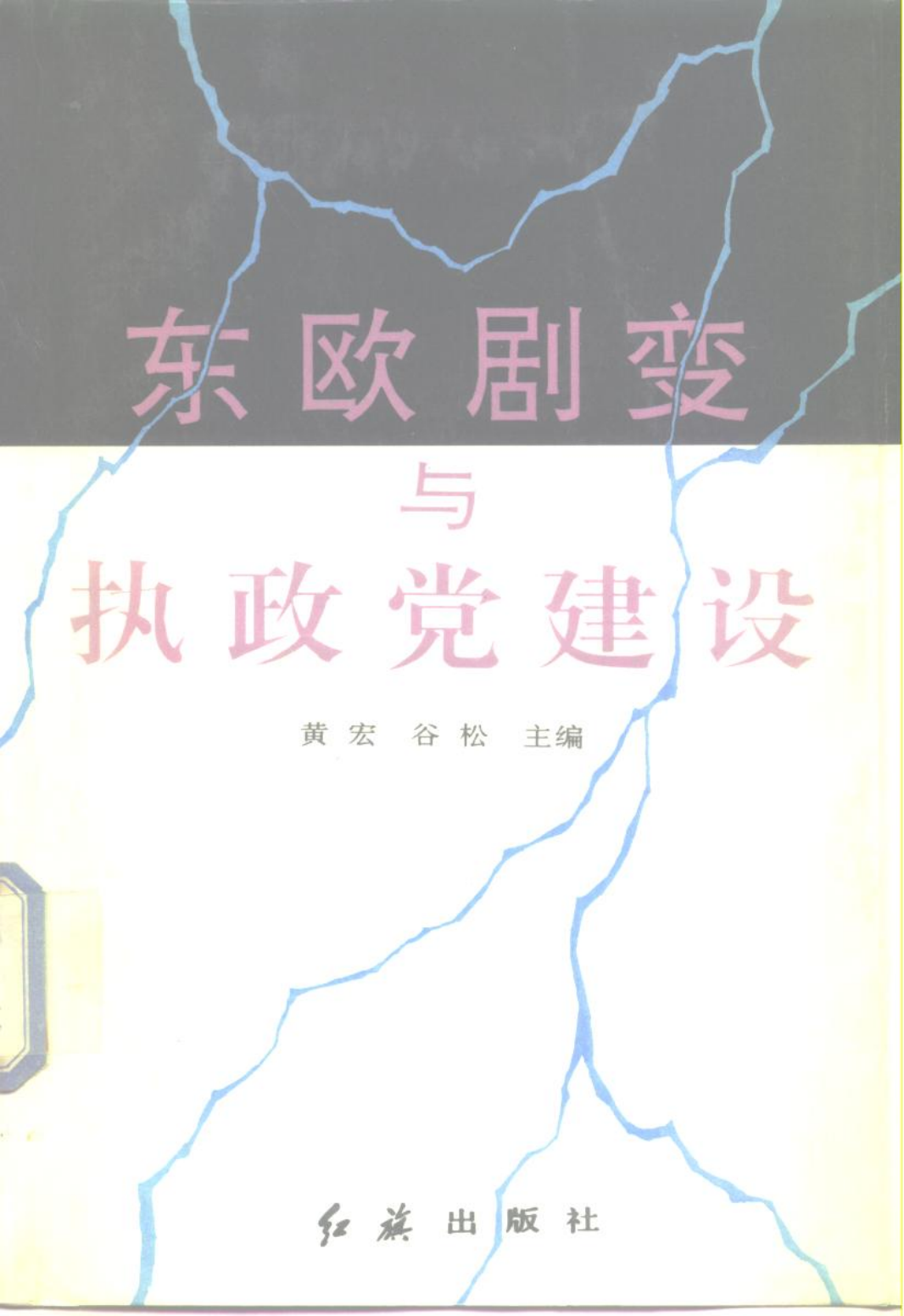




东欧剧变 与 执政党建设

黄宏 谷松 主编

红旗出版社

东欧剧变 与 执政党建设

黄宏 谷松 主编

红旗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8 号

东欧剧变与执政党建设

黄宏 谷松 主编

*

红旗出版社出版

(北京沙滩北街2号)

责任编辑 李 凡 封面设计 吴建群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33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ISBN 7-80068-242-0/D·96 定价 5.20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1989年，东欧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的共产党相继丧失了政权，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政局也在激烈动荡。一年多来的事实清楚地说明，这场剧变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次严重的挫折。

在这些国家，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聚集起来，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起一次又一次进攻。无产阶级的政权相继落入了右翼资产阶级政党的手中，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逐步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政局持续动荡，经济迅速衰退，治安严重恶化，通货膨胀，失业剧增，民族分立主义也愈演愈烈，社会日益走向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千百万东欧人民40多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成果，正逐步丧失。在这些国家，不仅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迫害，不少人丧失工作的权利，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普通人民群众也深受其害，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40多年前流亡海外的皇室贵族、地主资本家却弹冠相庆，纷纷卷土重来。

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酷现实，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不得不深思，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应该从中吸取一些什么教训。

东欧剧变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40多年来，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企图，东欧历来被视为社会

主义阵地的薄弱环节，一直是西方和平演变的重点地区，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和经济的渗透从未停止过。而苏联 80 年代中期以来实行“新思维”，内外政策发生的根本转变，对历来受制于人的东欧国家来说，更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其内部的演变产生了直接的催化作用。然而对东欧党来说，这些毕竟还是外因，最终都要通过东欧党自身的政策才能起作用。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东欧党自身建设上的教训，更带有根本性。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兴衰存亡。匈牙利社工党的主席蒂尔迈尔一针见血而又十分痛心地说：“社工党丧失政权是党的自杀政策造成的”。联系东欧党的自身建设，认真总结和反思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对正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显然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那么东欧国家的党在自身建设上有哪些需要特别引起我们重视和深思的教训呢？

一、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已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重要形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思想警惕，要敢于和善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早在 50 年代，美国就提出了“和平解放”东欧的政策，1956 年匈牙利事件后，美国进一步认定，东欧是“苏联铁甲里面的脆弱部分，是一个潜在的炎症根源”，企图从这里打开和平演变的突破口。在东欧国家中，美国又在寻找更为薄弱的环节，作为和平演变的领头羊。从 60 年代起，波兰就是西方竭力拉拢的对象，美国给予波兰最惠国待遇和大量贷款，以此为诱饵，通过经济、思想、文化渗透，影响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态度。80 年代初，波兰团结工会兴起，西方国家立即插手工潮和动乱，从直接资助团结工会大量经费、物资，一昼夜 36 小时的波兰语广播，派出上千

记者，对波实行“心理宣传战略”，到使用外交干涉、经济制裁，包括食品武器，企图压波兰党和政府就范，无所不用其极。当时波兰党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坚决实行军事管制，取缔了团结工会的非法活动，坚决揭露了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使国家渡过了暂时的危机。

但是 80 年代后半期以来，东欧国家改革中遇到各种困难，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尤其是在所谓“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影响下，放弃了对西方和平演变的警惕，这就为美国和西方加紧对东欧和平演变创造了条件。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要利用“苏联的变化”，“鼓励进行民主改革”。尼克松在 1988 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得意地声称：“当前，东欧进行我们所希望的和平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其根据除“经济实施了逐步的自由化”外，还有“允许西方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不受干扰地直接向该国播放节目”，甚至可以“买到西方的报纸”。可见，早在东欧剧变前相当一段时间里，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已经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装，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渗透，特别是关于资产阶级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及个人主义价值观、政治观的宣传，早已通行无阻，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日益泛滥，从而为反对派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提供了时机和条件。

在 1989 年的东欧剧变中，美国和西方国家更是直接插手，竭力扶植各国反对派。波兰的团结工会、民德的新论坛、捷克的公民论坛、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组织，经费都是西方提供的。西方国家一些头面人物，甚至亲自出马，干涉东欧国家内政，进行颠覆活动。美国驻匈牙利的大使直接走上街头参加反对派的示威游行。波兰 1989 年 6 月大选期间，布热津斯基亲自到现场指挥。7 月，美国总统布什也跑到前台，出访波兰和匈牙利，诱压兼施，鼓吹“朝民主的多党派选举方向前进”。而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

领导人却毫无警惕，期望通过迎合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换取西方的经济援助，缓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成为了西方和平演变的俘虏。这是一个极其沉痛而又可悲的教训。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在东欧一些国家已经得手。这种状况表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情况下，国际间阶级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已成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重要形式。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应该高度重视这种斗争的新形式，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终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一套完整的、一以贯之的反演变的战略、策略，把党在思想上武装起来，成为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堡垒。

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发展和泛滥，是导致东欧各国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严重涣散，乃至完全丧失战斗力的根本原因。东欧剧变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历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较深，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曾有过几度合作和分裂的历史。在第三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曾形成了一批左派党，由于在反动统治下，有的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只能进行秘密活动，造成一段时间里社会党的力量 and 影响要大于共产党。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东欧各国共产党走上了执政的舞台，这些国家的社会党发生了分化。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都出现了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和合并。一方面，这是左派队伍的胜利，显示了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另一方面，也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这些党内的发展留下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7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如何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政

治、经济体制，加速经济发展，增强社会主义活力的问题。西方敌对势力趁机大肆兜售“共产主义失败论”，借口批判所谓“斯大林模式”，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同时积极宣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就直截了当地说“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方法。”可见西方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利用民主社会主义作为通向资本主义的桥梁，是比直接兜售资本主义更为有效的演变方式。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开来。苏联首先提出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长期深受苏联影响的东欧各国党面对西方施加的压力和社会上反对派的进攻，在社会主义发展出现暂时曲折的情况下，一些思想不够坚定的人，错误地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摆脱危机的出路和良方，以致民主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党内逐步占了上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而改变党的工人阶级性质。

那么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不是一种摆脱危机的社会主义选择呢，实践是无情的，东欧剧变的全部实践不仅没有说明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恰恰以严酷的现实，宣布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东欧各国，无论是最早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谈的波兰，还是最后一个丧失了大部政权的保加利亚，乃至现在正在激烈动荡的阿尔巴尼亚，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搞所谓公开性、多元化、多党制、实行议会民主，纵容或人为地扶植反对派，而后就是一步步地后退和让步，最后纷纷宣布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改名为社会党，导致党的削弱和分裂。等到反对派羽翼已丰，便取而代之，夺取政权，原来执政的共产党变成在野党，沦为被专政的对象。民

主社会主义被丢到了一边，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搞民主社会主义的，没有一个站住脚，却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了道路。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到头来自己也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历史就这样无情地嘲弄了民主社会主义者。

东欧剧变的性质和后果证明，民主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党内的反映，是在当代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改革和更新。如果说在资产阶级执政的条件下，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还对资本主义具有改良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就连这点积极意义也没有了，它实际上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反对派向无产阶级夺权，颠覆社会主义的内应和助手。东欧剧变的过程，也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接受并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过程。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高度警惕各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党的侵袭，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保持党在思想理论上的纯洁性。

三、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进行社会革命和建设的必要条件。东欧党在国家政权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宣布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议会制，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导致了政权的丧失。

建国初期，处在东西方对峙的复杂国际环境下，东欧各国共产党曾受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影响，推行过一段“左”的政策，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大批党的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和镇压，对这些错误进行纠正和总结是必要的。但其后，东欧党在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思想影响下，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相继宣布本国已不存在敌对阶级，无产阶级

本身已经发生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已不再适用，阶级斗争观念严重淡化，国家的专政作用被严重削弱。

80年代末期以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东欧一些国家的党更醉心于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企图搞什么多元化、多党制，将政治体制改革引入了歧途，这就为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东欧国家中长期存在一批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得到西方和教会的支持，人数不多，能量不小，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有相当的影响。他们利用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的正当愿望和反对苏联控制的民族情绪，煽动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而东欧一些国家的党却低估了这些人的能量和影响，对他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夺取政权的目的缺乏清醒的认识。为了搞什么政治多元化，不仅允许他们合法存在，人为扶植他们的发展，甚至同意和他们分权，结果使这股反对派势力迅速膨胀，越闹越凶，越闹越大，将共产党推下了台。

波党丧失政权就是从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化，同意分权开始的。1989年初，波党将早已被取缔的团结工会作为“建设性反对派”，允许其合法化，同意和他们召开圆桌会议，希望以此达成民族和解，克服社会、经济危机。开始团结工会也作出承诺，作为建设性的反对派，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但一旦公开活动，它立刻把伪装抛弃，露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明确提出要“共产党放弃那种只让共产党发挥唯一政治作用的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没有妥协的余地。”波党的妥协退让，使自己先是在议会丧失多数，而后让团结工会组织政府，最后倡导多元化、多党制的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任期不到就被赶下了台。波兰国内出现了激烈的反共浪潮，原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财产全部被没收。匈牙利反对派的迅速发展更是党的机会主义政策造成的。1987

年以前，匈牙利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到1987年9月在波日高依的支持下才出现了约有300人组成的“民主论坛”。1988年5月以来，匈党在倡导多元化的同时大力鼓励和支持成立各种政治组织，使这些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89年8月，匈党同反对派经过两个月的圆桌会议讨论之后，达成秘密协议：未来总统和政府中的外交、国防、内务部长职务留给匈党，由反对派人士任总理。匈党轻信了反对派的诺言，同意分权。后来反对派步步进逼，一步步迫使匈党全部交出了政权。

那么实行所谓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是否带来了真正的民主呢？东欧剧变的事实说明民主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对这些反对派来说，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要求实行所谓民主，不过是夺权的手段。权力不到手，闹事就不会停止。保加利亚反对派有一句名言：“千百万人不上街，问题就解决不了。”尽管保加利亚社会党在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反对派仍然大搞街头政治，占领“九·九”广场，火烧社会党大楼，实行占领性罢课，在议会内动不动就宣布退场休会，结果竟然形成了社会党的多数服从反对派少数的局面。取得大选胜利的保党，先是让出了总统职务，后又宣布总理辞职，刚刚成立70天的合法政府竟然被反对派的街头政治赶下了台了。

正是由于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取消了党的领导作用，搞什么军队和护法机关非政治化，使得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人民军队在国家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急时刻，无能为力。然而反对派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却十分明确地对军队和专政机器进行彻底的清洗，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这个机器，把东欧各国党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投入了监狱。捷共一位领导人在动乱初期曾带头上街示威游行，呼喊拥护“自由选举”的口号。该党失去政权后，他却几乎天天收到恫吓信。他在讲话中说：

“现在仍然对共产党人进行迫害，对他们及其家属进行污蔑和恫吓。”“有可能为我们共产党人找到新的监狱或象某些人呼吁的那样，找到新的集中营。我每天都收到一些信件，威胁要把我们和我本人吊死在路灯上。我必须再次问道，对所有人实行平等条件、自由选举和不仇视的呼吁是否还有效？”其实答案是很清楚、很简单的、没有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一旦丧失社会主义政权，实行的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遭受严重的挫折，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在国家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接受了机会主义，把党引上了歧途。70年前，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国家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反对和痛斥机会主义的教导，今天读来仍然警钟长鸣，撼人心魄，值得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深思。

四、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政治投机家，党的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是导致党内分裂的重要因素。东欧剧变的教训说明，必须高度重视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特别是领导核心的团结，坚持党的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决不允许出现派别组织与派别活动。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都是执政党，有的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员比例占到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为什么在反对派的进攻面前如此涣散和软弱？不仅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就连这些国家的反对派自己也感到奇怪和惊讶。对东欧剧变的过程加以考察，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这些党的领导层都发生了重大分歧，在领导核心内出现了少数政治投机家，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坚持

要用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改造党，不惜在党内进行公开的派别活动，用阴谋手段夺取党的最高权力，造成党在组织上的涣散和分裂，使党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匈牙利社工党的分裂就是一个典型。1988年5月，波日高依、内梅特等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占据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从此，匈党领导层便无团结可言。他们把卡达尔等8名政治局委员赶下台，而后又强制推行其所谓走西欧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机会主义路线。波日高依这位曾被西方报刊称作“最亲近西方的人”，曾对意大利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提出要将党改名为社会党，如果党不接受他的主张，他就将“退出这个风格过于陈旧的党”。他不止一次地声称，他从来没有相信过社会主义。他与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结成一伙，与反对派内外呼应，取消了党在工作单位的基层组织，解散了工人卫队，交出了党对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权。而党的其他领导人又无原则地与他们讲团结，没有勇气与机会主义决裂。结果使党内分歧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组织的分裂。原有72万党员的社工党分裂成了两个分别只有6.5万和5.5万人的小党。波日高依在竞选总统失败后，正式宣布退党，完全暴露了他个人野心家的本质，匈社工党中央发言人最近在总结该党失败的原因时说，“匈党分裂首先是来自上层，来自称为‘激进派’的那几个人”。正是因为党内出了个人野心家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形成了党内反对派，党内内讧，大大削弱了党的力量，以至在反对派的进攻面前不堪一击，败下阵来。

波党是在局势动荡时，领导层在如何对待反对派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导致党本身产生危机，最终败在反对派手中。民德、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有类似的情况。民德党内以“改革派”自居的莫德罗和克伦茨等领导人，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向反

对派步步退让，把统一社会党改造为社会民主党，最后不仅自己下台，成为失业者，而且造成了亡党亡国之痛。保加利亚的姆拉德诺夫和卢卡诺夫，曾是日夫科夫选中的接班人，然而，在他们夺取了党、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后，对党的领导层实行清洗，造成拥有 90 万党员的保党在开始只有几十个人的反对派组织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后来又把大选的胜利成果拱手相让，终于丧失了大部政权，他们自己也被反对派赶下了台。

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要攫取党的权力，必然要破坏党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公开进行派别活动。波日高依就曾多次把党内的重大分歧公之于众，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混乱。匈牙利第一个反对派组织“改革俱乐部”，就是在他的支持下，由党内一些人先搞起来的。

从东欧党的教训看，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以能一步步地篡夺党的领导权，就在于他们善于伪装自己。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他们都是以“改革家”的面目出现，并以“改革”的名义推行其机会主义路线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区分两种改革观，并以此作为鉴别和衡量干部的重要尺度的问题。对那些以改革为名，实则坚持要搞资本主义一套的人，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决不能把他们放在领导岗位上。防止党的分裂和蜕变，尤其要重视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既同公开的资产阶级战斗，又同自己队伍内部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战斗。党内的机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破坏作用要比公开的敌对力量大得多。东欧剧变再一次说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西方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是西方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西方资产阶级无法直接办到的事，如从宪法中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等，正是通过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来实现的。正是在他们帮

助下，西方资产阶级 40 年未能打破的“铁幕”，在顷刻之间被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十分注意在党内、尤其是领导层培植所谓“自由种子”，寻找代理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高度警惕在领导核心中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个人野心家。在他们企图改变党的性质的关键时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敢于与机会主义作彻底的决裂，保持党内的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性，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五、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崭新事业，必然会有曲折和错误，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正确地总结执政的历史经验，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东欧剧变的教训说明，文过饰非，保守僵化，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就会使党脱离群众；而搞什么“无限度的公开性”，全盘否定党的历史，使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更会被反对派利用，成为他们反共夺权的口实。

40 多年来，东欧各国党在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也有过不少的失误。由苏联移植过来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建国初期，曾经对急需动员全部资源和人力医治战争创伤，集中把工业搞上去的东欧各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逐步暴露出不少的弊端。东欧各国党在处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知识分子等问题上，也有过不少的教训，需要深入的反思和总结。只要善于及时、正确地总结无产阶级执政的历史经验，坚持改革，就能使党在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中成熟起来。遗憾的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东欧一些国家的党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对错误采取了文过饰非的态度，没有勇气主动地揭露矛盾，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中弊端大胆地进行改革，致使一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问题，长期没能作出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对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

价，就没有很好地将少数人企图将国家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与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改革和反对外来干涉的正当要求区别开来，牵涉和伤害了二十多万人。这不仅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党的形象，留下了后遗症，而且必然会被反对派和敌对势力用作蛊惑宣传的炮弹。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爆发的政治动乱，就是以“要求为68年事件平反”为导火线的。

本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总结东欧党40多年来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兴利除弊，对于统一思想，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团结全体人民继续前进，是十分必要的。但近年来东欧国家却走到另一个极端，在“新思维”的影响下，错误地提出“无限度的公开性”、“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使改革走上了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打倒自己的道路。在这些国家，听任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的观点通行无阻，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成了一种时髦，似乎否定得越多、越彻底越好，所谓的改革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否定，结果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团漆黑，大大动摇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波党内以费什巴赫为代表的一派把波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说成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一部“斯大林主义在波兰实践的历史”，提出同它“一刀两断”。匈党在批判过去的错误时，认为40年所走过的道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只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道路。东欧一些党把整个4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称为“斯大林模式”的“专制社会主义”，统统加以抛弃，实际把矛头对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4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自然也就否定了自己执政的根据，这无疑是在给反对派夺权的磨盘里注了水。捷反对派发表声明，说什么“41年共产党极

权专政使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遭到破坏”。捷“公民论坛”主席称 1948 年捷共掌权“是一次政变”。匈自由民主战联盟的头面人物叫嚷，几十年来匈实行的是“罪恶的制度”，人们正在埋葬一个强加于匈的堕落政权”。东欧党一些人天真地以为对过去否定得越多，越表明同过去划清了界线，越表明自己是革新了的党，企图以此来博得反对派的好感，以保住政权，而恰恰正是这种过头的批判，为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剧。

六、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就在于它能够最终创造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东欧一些国家的党在经济工作中出现了大的失误，未能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酿成动乱的重要因素，执政的共产党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努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努力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资本主义，就会逐渐失去民心，并被反对派所利用，甚至丧失政权。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一定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战后初期，东欧国家在建立人民政权之后，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力曾有过迅速的发展。东欧历史上一直是欧洲最落后的地区，除捷克斯洛伐克战前可以称为工业化国家外，其它都是落后的农业国。战前波兰工业和手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 30%，73.8% 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一半以上的耕地掌握在地主和教会的手里。匈牙利曾被称之为三百万乞丐的国家。罗马尼亚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战前人均收入曾为欧洲的倒数第一位，全国有 400 万文盲，保加利亚历史上屡遭异族入侵和奴役，